·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DOI:10.20004/j.cnki.ujn.2025.01.003

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理论构建

席　恒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以民生福祉保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保障学科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相伴而生。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社会保障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基础社会科学中借鉴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结合中国情境、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价值理念与研究范式,显现了中国社会保障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表达。但与相对成熟的基础社会学科相比,作为应用社会科学的社会保障学科尚不成熟,尤其表现在缺乏立足于中国情境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理论建构。基于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和文化传统,力图从民生福祉保障的动力机制、发生机制和分配机制视角,构建适应性选择理论、合作收益理论与合作共享理论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以期提升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发展并繁荣中国社会保障学科的基础理论。

[关键词]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适应性选择;合作收益;合作共享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1-0021-09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存在知识分散化、碎片化的突出问题,尚未建构起系统化、自主化的知识体系。社会保障学科亦是如此。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特征是中国自主,一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二是立足中国经验,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三是鼓励主动思考,培养自觉行动;四是注重原创成果,倡导开拓创新②。

一、中国社会保障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库恩指出,任何学科都有过从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过渡历史③。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是:是否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相对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相对完整的师资队伍体系、相对确定的研究领域、相对确定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及是否有基本共识和学科内外的公认度、稳定的高质量产出和学科影响力、属于本学科的专门术语和基础理论。发源于西方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在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研究"(项目编号:21STA002)。

[作者简介]席恒,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邮箱:xihengxian@163.com。

①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②谢伏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2年5月17日第9版。

③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仑,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8页。

方的学术语境中是一个研究领域,但在其学科分类中并没有社会保障这一学科。而在中国,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①]。正是基于对社会保障是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的认识,中国社会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同时,立足于中国政治文化和教育行政管理特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1998年正式将社会保障列为管理学门类公共管理(之后改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对照上述指标,社会保障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相对成熟的基础学科相比,社会保障学科的成熟度还不高,还需要社会保障研究同行的共同努力。

在中国社会保障的学术发展中,中国学者力图基于中国情境、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解释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和社会保障学科的发展,初步显现了中国社会保障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表达。其中以植根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合作共享理论解释社会保障的机制设计,既表达了社会保障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形态;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的社区慈善解释公益慈善的发生逻辑,既凝结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一般特征,也能展现中国基层公益慈善的“邻友效应”。这种中国现象的中国表达,是中国社会保障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方面。

二、社会科学学科丛林中的社会保障学科

现代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学科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尤其是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它使人类的认知从神话传说走向理性思维,理解自然与社会规律,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学科分类[②],为后世各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奠定了基础。作为研究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科学,自从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分野,一直承担着认识社会、解释社会,预测社会发展趋势的功能。随着人类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认识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科学也在不断深化,逐步衍生出“基础社会科学”和“应用社会科学”。随着人类对社会领域认知的不断深化,形成了“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社会科学—应用社会科学”纷繁复杂的社会科学学科丛林。

在中国的语境与学科分类中,社会保障学科是隶属于民生福祉保障领域的知识体系,因而属于应用社会科学范畴。作为应用社会科学,社会保障学科从相关的基础社会科学借鉴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并通过对自身专属领域的理论、方法借鉴和范式创新,不断提升其学科水平(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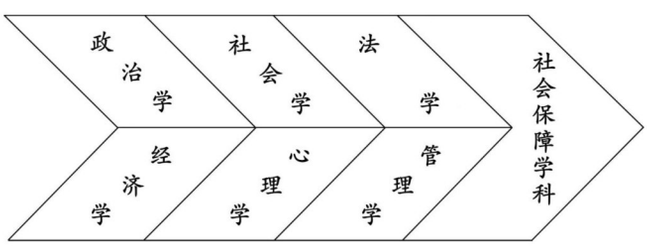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科学丛林中的社会保障学科

①习近平:《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2月28日第1版。

②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7-169页。

如图2所示，社会保障学科是事关民生福祉保障的知识体系。其中，民生福祉保障是为了降低社会成员的脆弱度，提高其适存度而进行的各类制度安排。而社会成员脆弱度表现为危机度和风险度；社会成员适存度（在某种环境条件下个体适应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程度）表现为满意度和幸福度。社会保障学科正是对民生福祉保障体系的专业研究和传承，是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社会保障知识体系需要基础社会科学的支撑，对国民民生福祉诉求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分析，构成社会保障学科认知的基础知识。因此，用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思考，用社会学去发现国民民生福祉需求问题，用经济学去分析国民民生福祉形成机制，用管理学来解决国民民生福祉的实现途径，是社会保障学科认知国民民生福祉实现机制的基本逻辑。此外，政治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分别以其权力分配、制度安排和行为动机的分析视角为社会保障学科认知国民民生福祉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多学科视角。在借鉴基础社会科学相关基础理论的同时，社会保障学科还借鉴了相关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通过对其适应性的改造，为本学科认知民生福祉保障的一般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其中，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结构功能分析、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和边际分析、政治学的比较政策分析、管理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和机制设计方法等，在社会保障学科分析和认知不同人群、不同领域民生福祉保障问题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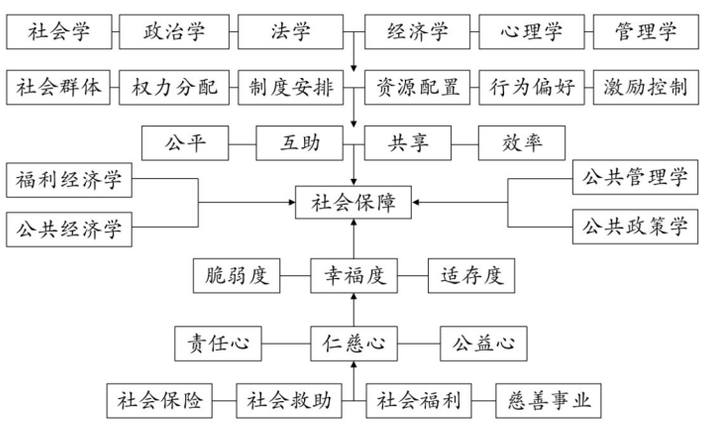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保障的知识体系

社会保障在长期演化中形成了公平正义、互助共济、合作共享和协同高效的价值理念[①]，使社会保障学科在民生福祉保障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独特的价值理念，也使得社会保障学科具有了有别于其他应用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在认知民生福祉保障实现机制的过程中，又分别从不同视角对认知民生福祉保障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分析逻辑，为社会保障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②]。

三、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理论构建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基于认知民生福祉保障的社会保障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该立足于中国丰富的社会保障实践和经验，进行基于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探索。

（一）民生福祉保障的行动逻辑：适应性选择理论

任何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③]。适应性选择理论用于解释和分析行动主体在社

①郑功成：《高度重视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群言》，2024年第2期。

②余澍：《现代化、社会保障与制度文明：历史轨迹与中国道路》，《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3期。

③席恒：《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好服务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8月29日第16版。

会场域的约束条件下适应性选择的状态和过程。适应性选择理论首先将行动主体置于社会运行机制之中(见图3)。基于人类活动是目的性与手段性相统一的原则,人类行动从宏观上可划分为四种机制,即强制性公益、强制性私益、志愿性公益和志愿性私益。强制性公益就是运用权力、政策法律和制度规范等手段,强制性的要求其成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机制;强制性私益是通过强权手段,强制性要求其成员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机制;志愿性公益是通过成员的志愿行为,自主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机制;志愿性私益是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机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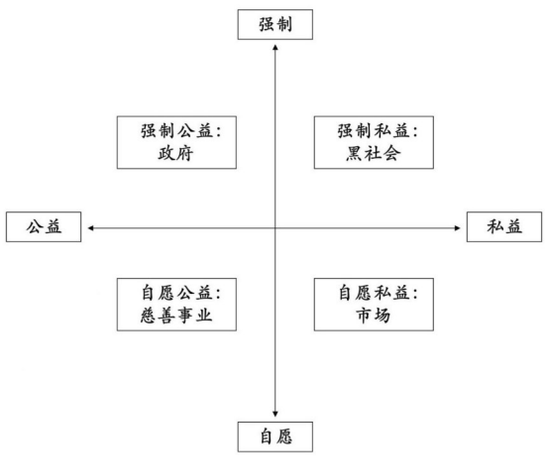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运行机制:目的—手段矩阵

适应性选择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同时,行动主体也会受到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在其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决定着其行动的选择。在工具"理性人"假设和社会网络的约束下,集体行动主体的行为均是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约束条件包括目标设定的目标约束和条件制约的条件约束。其中,条件约束是其行动选择的现实制约性,目标约束是其行动选择的未来可能性。即在正确的时间(条件约束),以正确的方式(策略选择)做正确的事情(目标约束)。

适应性选择理论主要分析行动主体在条件约束与目标约束之间寻求行动策略均衡的过程,其分析的基本思路是:行动目标设定,即明确行动主体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约束条件分析,即分析行动主体达成行动目标的各种约束条件;行动策略选择(包括行动政策设计或调整),即在约束条件下要达成行动目标可能采取的行动策略。约束条件分析包括制度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管理与技术条件等;行动目标设定包括单一目标设定和多目标设定(如果是多目标设定,则要考察多目标的合意性和协同性)。适应性选择理论是对社会行动理论和理性决策理论在社会结构中的拓展和精细化,更符合集体行动中个体决策的行为预期。

社会保障对民生福祉保障的政策设计和服务实现也是不同行动主体在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一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社会保险政策费率与待遇(包括参量政策)的确定机制设计、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筹资与水平的确定、健康养老服务的有效实现等,无不是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依据本国的国情,在本国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

(二)民生福祉保障的发生机制:合作收益理论

合作收益理论用于解释和分析集体行动时,不同主体如何实现合作收益的最大化和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合作收益理论将集体行动视为合作秩序的达成过程,在人类合作秩序经由血缘内合作到超血缘合作之后,超血缘合作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状态。基于社会分工,形成社会领域的

①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共处共生”型合作、经济领域的“互惠互利”型合作和政治领域的“共创共享”型合作[①]。合作秩序的达成一方面是集体行动主体的合作生产，另一方面是合作收益的合理分配。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是因为合作能产生收益。合作秩序的必要性是因为它能够为合作各方带来额外收益，使他们共享或分享；合作秩序的可能性是因为存在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条件，能把具有“经济人”倾向和“公益人”倾向的行为，规整到有利于合作秩序达成的“理性人”倾向的行动之中。

合作收益是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长期合作博弈的结果。正如里查德·道金斯的分析，为了确保自私的基因的复制，生物界、两性之间、代际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长期合作博弈，最终选择共享、互助、合作的策略来确保种群的利益最大化[②]。长期合作博弈的实施，需要多次重复、足够的参与者数量、相对封闭稳定的系统、参与者既对当期利益考量又对未来利益预期和对非合作博弈策略实施可信而有效的惩罚。长期合作博弈实际上是参与者妥协或利益让渡的结果，通过长期合作博弈，能够实现参与者的合作收益。

因此，在给定条件下，合作能够实现人们比不合作更多的收益进而促进生产效能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形成合作生产力。所谓合作生产力，是指在有效控制合作成本的某种制度安排下，有合作能力的合作者自愿从事合作对于整个社会合作过程做出的贡献。它是由个体的合作意愿（α）、合作资本（β）和合作的制度条件（γ）所构成的一个函数。即：合作生产力函数 $P=F(\alpha,\beta,\gamma)$。

其中，合作意愿是合作者参与合作的前提条件，其大小可用合作的预期收益来测度；合作资本用于度量参考者合作的能力大小，包括合作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制度条件是指降低或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所需要的外在制度。合作意愿与合作资本是由合作参与者决定的两个变量，如果这两个变量恒定，则合作收益取决于合作的制度条件，即降低或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所需要的约束条件。

从这种意义上，合作行为的达成，也是在合作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合作机制的约束条件是合作达成可能遇到的障碍，即合作成本。在合作演进过程中，至少有四类合作成本：一是合作之前的排他成本或防范成本，即每个行为人防范他人侵犯自己产权的成本或保护产权的成本；二是合作之初的信息成本，即为了寻求合作而需要付出的信息搜寻成本；三是合作过程中的监督成本，即为了保证参与各方践行合作承诺所要付出的约束成本；四是合作之后的收益分配过程中的谈判成本，即为保证合作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付出的妥协成本[③]。显然，在合作的生产成本确定条件下，合作收益的实现程度与达成合作的交易成本密切相关。

因此，克服合作的约束条件就是寻求降低或减少这四类合作成本所需要的支持条件。排他成本或防范成本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信任问题。因此，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可以有效降低防范成本。其中公共部门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机制创设的关键。信息成本本质是一个信任共享问题，建立信任共享机制可以有效降低信任成本。信息共享机制是人类一切交换活动的基础，对于集体行动而言，公众对集体行动信息的知情程度直接影响着集体行动的效率，构建集体行动的共享机制其实质是降低或减少成员之间的谈判成本，其中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是信息共享机制创设的关键。监督成本本质上是违约行为的惩罚问题，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可以有效降低监督成本。监督约束机制是保障人类一切交互行为的基础，对于合作生产而言，信守承诺以及对非信守承诺的有效且可信的惩罚，是保障集体行动正常运行的前提，其实质是降低或减少集体行动中的监督成本，因此，对非信守承诺的有效且可信的惩罚以及对信守承诺行为的有效激励是监督约束机制创设的关键。谈判成本本质上是利益分配问题，建立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谈判成本。利益分配机制是人

①席恒，雷晓康：《合作收益与公共管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1期。

②里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张岱云，王兵译：《自私的基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③席恒：《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均衡——基于合作收益的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类一切活动动机的基础,如何在合作生产中获得合作收益并得到预期的分配,是每一个“理性人”一切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其实质是如何降低或减少参与者对收益预期达成共识的协调成本,因此,参与者如何达成对合作收益分配的共识或趋向共识,是利益分配机制创设的关键。因此,在创设条件或利用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有效地控制合作的交易成本,在合作边界确定的情况下,可实现合作收益的最大化。

此外,合作行为与合谋行为不同。与合谋行为相比,合作行为和合作收益是合作参与者在获取其正当收益的前提下,并不损害任何第三方的收益,以保障整体社会的帕累托效率。在合作生产力最大化的基础上,合作收益如何合理分配,则是集体行动合作机制达成的关键。分配问题事关人们利益的实现,在集体行动合作生产的条件下,个体对合作生产的贡献度,分配规则和分配的标的物,合作的制度条件等均会影响分配效率。因此,可依据影响分配效率的关键要素,构建一个合作收益分配效率函数$P=F(\alpha_1, \beta_1, \gamma_1)$。

其中α_1为合作收益的预期值,它由合作生产参与者对合作事务知晓度、关注度、参与度和贡献度决定,因为从主观上,个体对于合作收益的预期,直接影响着个体对合作事务的参与和贡献。β_1为分配标的物,可细分为公共收益、共同收益、个体收益。γ_1为合作的制度条件。在合作生产力函数的基础上,如果合作的制度条件相对恒定,则合作收益分配效率与参与者对合作收益的预期值和分配的标的物密切相关。合作收益的预期值由合作生产参与者对合作事务的知晓度、关注度、参与度、贡献度一组递进指标决定,分配的标的物由合作生产产出的公共收益、共同收益、个体收益构成,考察合作生产参与者的知晓度、关注度、参与度和贡献度,并寻求与合作生产产出的公共收益、共同收益、个体收益的匹配,在合作制度条件相对恒定的条件下,可实现合作收益分配的相对合理化(见表1)。

表1　合作参与度与分配标的物

合作参与度	分配标的物
知晓度	公共收益
关注度	公共收益
参与度	公共收益、共同收益
贡献度	公共收益、共同收益、个体收益

合作收益分配函数实际上是合作生产力函数纠偏函数(对初始制度的校正)。因此,在制度条件相对恒定前提下,合作分配效率与外在条件和合作收益预期等相关。合作收益分配效率函数的意义在于,个体对于合作收益的主观预期,直接影响着个体对合作事务的参与和贡献;从管理的角度,如果创设条件,明确预期,则对个体参与合作并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激励。

合作收益理论是合作条件下成本收益(竞争条件下)的应用,以期通过合作成本的识别和控制,寻求集体决策中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合作收益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合作成本的识别和计算,寻求合作参与方的比较收益。合作收益理论也是对合作生产理论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合作生产机制的分析,并基于合作生产参与者的贡献度及其与分配标的物的匹配,可实现从合作生产机制到合作收益分配机制的进化。

民生福祉保障的政策设计是各责任主体围绕不同行动主体的社会保障权益实现而建立的合作机制,目的是建立稳定的安全预期,以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与利益均衡(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得益彰)[①]。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生产和养老金给付、健康保障的健康生产力、社会救助的家计生产力或致富能力及社会福利函数均是合作收益机制设计的体现。养老金

①席恒:《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1期。

机制本质上是养老金的生产与分配问题。养老金的筹资实际上是一个养老金生产过程。它是由养老金的生产要素(缴费基数、费率、缴费年限、工作年限、退休年龄)构成的生产函数,决定着养老金产出水平。养老金的待遇给付实际上是一个养老金的分配问题。它是由养老金的分配因子(退休前一地社会平均工资、参保人的劳动贡献指数、工作年限、缴费年限、平均余命、目标替代率)构成的给付函数,决定着养老金待遇水平[①]。健康保障是由健康目标、健康资本和健康政策构成的生产函数,它决定着个社会健康保障的水平。社会结构中家庭的生计能力或致富能力是由其经济资本,健康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策支持力、环境支持力等构成的函数(家计生产力或致富能力函数),它决定着家庭物质生活的丰盈程度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取决于可以用于改善福利的资源总量、社会成员数量和资源的分配政策,它是由经济增长函数与社会福利函数构成的联立函数。

(三)民生福祉保障的社会功能:合作共享理论

合作共享理论是合作收益理论的延续与深化,用于解释和分析公益机制和联盟经济活动等集体行动的社会后果。合作共享理论将集体行动视为合作的结果,人们进行合作的目的正是企图得到更多的合作收益。而在公益机制和联盟经济活动的合作收益中,获得合作的公共收益,使全体成员共享,是合作共同体的基本目标。人类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利益实现是其存在的基础。而其利益可分为公共利益(或公共收益)、共同利益(或共同收益)和个体利益(或个体收益)。纵观人类权益的实现,本质上是生产成果的分配过程。根据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和分配对象(标的物)的范围,可以将人类权益实现的方式可分为利益共享、利益分享与利益独享,并通过责任共担、责任分担和责任独担,形成一定的社会管理体系(见表1)。人们合作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利益共享,因为受自然禀赋的影响,一些人的利益分享和利益独享往往会受到某些条件约束,因此,通过合作生产,实现利益共享便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必然选择(见表2)。

表2　不同的利益类型及实现形式

利益类型	个体利益	共同利益	公共利益
实现方式	利益独享	利益分享	利益共享
责任类型	个体责任	共同责任	公共责任
承担方式	责任独担	责任分担	责任共担

共享是政治学家在无知之幕假设下,社会给予最小受惠者带来最大的利益,即全体成员共享一部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从而为每一个个体创设发展条件与机会,社会才有可能正义[②]。共享是社会学家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形成的共同体的利益互惠与再分配[③]。共享是经济学家在不同产权配置下的利益实现方式,在公共产权(共有产权)条件下,共享产权收益是每个成员的基本权益[④](如何规避集权和独裁是公共产权下共享面临的问题),在私人产权条件下,通过产权交易(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转让)能够实现收益在不同成员的分享甚至共享[⑤](如何保障交易的充分性实现自由交易是是私人产权下充分分享即趋于共享面临的问题),同时,在全要素生产中,由于不同经济主体参与价值共创,必然要求在利益实现中参与公共分配从而实现由价值共创到价值共享的升华[⑥]。

①席恒:《养老金函数及其政策意义》,《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2期。

②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6.

③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④刘尚希,吉富星:《公共产权制度:公共资源收益全民共享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⑤Schor J. B. , Walker E. T. , Lee C. W. ,et al. , On the Sharing Economy, *Contexts*, No. 1, 2015, pp. 12-19.

⑥Ind N. , Coates N. ,The Meanings of Co-creation,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Vol. 25, No. 1, 2013, pp. 86-95.

合作共享理论主要分析社会行动的主体在合作收益基础上对合作收益的公共分配机制,以确定全体社会行动主体的利益共享程度。其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将社会行动主体的合作收益区分为公共收益(公共利益)、共同收益(共同利益)和个体收益(个体利益),由此形成“共享层—分享层—独享层”的利益分配格局;分析共享机制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逻辑,以寻求利益共享机制在不同社会场域中的发生机制和实现方式;探索社会行动主体在不同社会事务中服务共享、资源(基金)共享、项目共享到权益共享的实现途径,以完善社会行动中的公共分配机制,实现由价值共创到价值共享的转化。合作共享理论是价值共创理论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延伸和应用,通过价值共创实现价值共享,才是共同体集体行动的目的。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日益扩大、社会风险日趋频繁而出现的、单个主体无法单独完成而需要多主体联合行动的集体行动,是为化解社会危机和防范社会风险、保障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权益而建立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社会保障的合作生产,首先是由社会保障政策的需求者、供给者及政策利益相关者基于政策目标合作生产社会保障政策。其次是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的供给者基于社会保障服务对象的需求合作生产社会保障服务。社会保障合作的目的,是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合作生产过程中,在实现自身收益的同时保障社会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障权益,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由于社会保障既涉及个体(社会保障参加人)的私人利益,也涉及共同体(职业年金计划参加人)的共同利益,更涉及全社会(社会保障体制与政策)的公共利益,因而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理想模式,是在明确基本保障和非基本保障的基础上,基本保障由各级政府承担,非基本保障由社会、家庭和个人承担。其中,基本保障实行无差别的公平原则;非基本保障实行有差别的公平原则,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互助机制、慈善机制来调节,个人和家庭可以自由选择、自主决定。

共享性社会保障具有以下特点:以服务全体社会成员为目标的全民性;以全面社会保障项目和服务为内容的全面性;以全体社会成员和责任主体参与为基础的共建性或共创性;以适应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为前提的渐进性。共享性社会保障包括以下内容:以基于国民待遇为全体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共享;基于目标人群需求为全体成员提供共享社会保障项目的项目共享;基于为全体成员建立稳定安全预期的资源(基金)共享;基于人的全面发展为全体成员权益保障提供社会保障支持的权益共享。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平、普惠的享有社会保障待遇和权益。共享性社会保障在全球许多国家已有多种形式的实践,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国民年金、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等,都是共享性社会保障方式的不同体现。特别是以“风险共识—责任共担—权益共享” 机制设计的社会保险政策,需要在缴费端以“能力—责任”匹配原则量能负担,在待遇端以“共识—共建”参与原则实现权益共享,更需要根据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适应性选择,通过社会保险参加者的合作收益与合作共享,才能保障社会保险政策的可持续性和高质量发展(见图4)。

社会保障的共享性特征和共享程度是社会保障制度文明的重要体现。共享性社会保障能够为每个人提供无差别的权益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和应享尽享。通过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应享尽享,为每个人提供无差别的权益保障,维护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权,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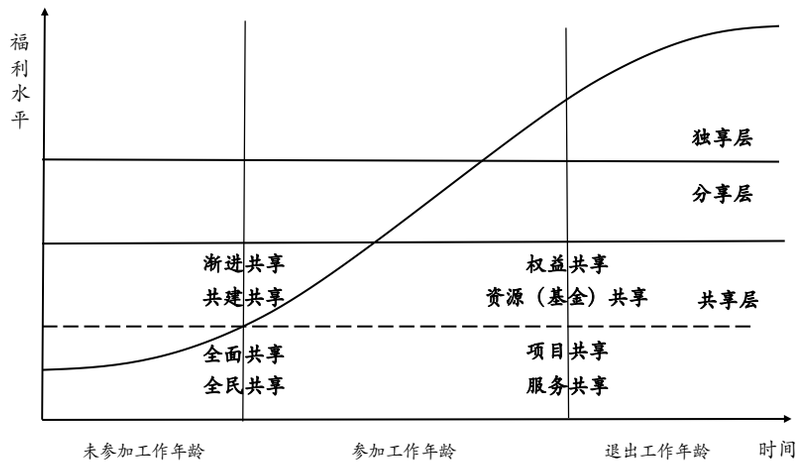


图 4　全生命周期下的共享性社会保障

共享性社会保障以公民社会保障权益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全体成员免于社会危机和风险，不断提升全体成员福利水平的有效方式。通过“共享—分享—独享”的制度结构，满足不同人群的社会保障需求，实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从“扩面”到“提质”。通过包容性、共享性和发展性的社会保障项目设计，不断适应新涌现的社会群体和新出现的社会风险，形成社会风险共识、社会责任共担和保障权益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社会保障供给对需求的精准满足和社会保障结构对功能的充分实现，为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不断促进我国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①]。共享性社会保障作为化解全体社会成员社会风险、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社会福利、最终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权益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减震器”“稳定器”“调节器”和“促进器”功能。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与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共享性社会保障凭借其覆盖范围广泛、功能多样及与其他政策的协同联动，以其赋能效应、增收效应、调节效应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共享性社会保障政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②]。共享性政策是以促进全体社会成员人人享有社会发展成果为目标，以降低全体社会成员在政策内外的交易成本为手段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其与发展性政策、包容性政策一起，从不同维度保障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权益。以共享理念设计共享政策，以共享政策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理论构建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与关键。通过学科的理论构建，形成本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专有术语和基础理论，为本学科的应用研究提供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才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本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保障学科只有立足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构建中国本土理论，进一步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才能维系中国社会保障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持续生命力。

［责任编辑：王文娟］

①席恒：《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1期。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216页。